

[奥地利]弗里茨·韦斯著

真理之路

花城出版社

12.54

95
£512.54

真 理 之 路
——事实、问题和历史著述的后果

〔奥地利〕弗里茨·韦斯 著
黄敬甫 韩强 译

花城出版社



C

123418

粤新登字 05 号

WIP 出版社：维也纳、慕尼黑、纽约、莫斯科

Copyright 版权：WIP 韦斯国际出版社 维也纳 1994

(本书中文版获得 WIP 出版社授权)

责任编辑 林青华

真理之路

〔奥地利〕弗里茨·韦斯著

黄敬甫 韩强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兴荣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插页 75,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761-8

L.1547 定价：3.00 元



Die ersten Kämpfer zur Verteidigung Stalingrads waren Arbeiterinnen und Arbeiter des Traktorenwerkes.



Die nach dem Grabhügel des turkmongolischen Chans Mamai (1361–1380) benannte Höhe bot einen weiten Überblick über das Fabriksgelände im Norden und das Geschäftsviertel im Süden Stalingrads



弗里茨·韦斯简介

弗里茨·沃斯(笔名)1920年2月19日出生于维也纳。1938年奥地利被占领后,他以候补军官身份参加德国国防军,时年18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任少尉,并作为前线军官参加攻占敦刻尔克战役以及占领诺曼底半岛战役。进军苏联时他隶属于北方集团军。这场损失日益惨重的东方战役,其作战地区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

1941年12月他任炮兵连指挥官,在拉多加湖以南沃尔霍夫斯特洛伊城外负伤。在野战医院治疗后他重返东线战场。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动攻势前夕他到达纳里曼,任德军与罗马尼亚第二十二步兵师之间的联络军官。

沃斯在斯大林格勒的地狱中幸免于难,但于1943年1月29日被俄军俘虏。5年后他重返家园,到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并获得博上头衔。1951年他任维也纳市教育局官员。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他于1957年秋首先在自己的出版社发表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狗,你们想水生吗?》

著名的保罗·冯·卓尔奈出版社获得此书的版权，并至 1964 年以前出版了沃斯的三部曲全书。由于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并在德语地区引起广泛评论（这种评论由于沃斯努力推动人民在国家意志形成方面发挥直接作用而得到促进），这些书闻名于世。

1960 年以来，沃斯任维也纳农业大学校长。他成功地使青年大学生对直接民主思想感到兴趣。他在大学中组织了一个直接民主利益组合，并与教授、助教和大学生们一道宣扬一种宪法，它使国民对国事直接参与决定和共同负责成为可能。

1968 年他建立了直接民主联盟，并于 1973 年 4 月 5 日发起奥地利环境保护运动。由于这些组织的无党派性与建设性的启蒙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奥地利人的自发积极性、建设和直接民主的意志表达。同时也使国家政治问题日益成为全民所关心的事情。

沃斯以枢密官身份退休之后，继续从事他原来的事业，正如他在其著作中所确定的，通过直接民主思想以鼓励人类建设性的政治思想，这就是民主法制与积极人道主义的原则。

目 录

弗里茨·韦斯简介	(1)
1943 年斯大林格勒——一个历史的转折	(1)
走向没落的道路	(5)
英美人士访问莫斯科	(10)
1938 年 3 月 13 日	
德军入侵奥地利前夕	(13)
风向标的时代和趋炎附势的政治家	(21)
1500 – 1556	
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	(29)
日不落帝国的顶峰及其没落	(31)
日不落帝国的精神根源	(32)
人道主义世界秩序的转折或者结束	(36)
1923 – 1933	
苏联援助了中欧和中国	(39)
1933 年 3 月 4 日	
奥地利人无辜经受了苦难时刻	(46)
发生在德国的那些后果严重的事件	(49)
“狗，你们想永生吗？”用以表示专制制度	(51)
1942 – 1943	
俄国人民重新赢得了自身的价值	(55)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 50 年	(59)
结论	(63)
弗里茨·韦斯的话（1993 年）	(64)

1942—1943

1943 年斯大林格勒——一个历史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在时隔 50 年后的今天,这场发生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河畔的、血腥而又愚蠢的拼杀又唤起了我们的记忆。

所谓法西斯入侵者一方:含有三个奥地利师和一个克罗地亚团的德国的第 6 集团军和第 4 坦克军大部计 35 万人(其中包括 5 万名奥地利人)在那里被包围,并于 1942 年 11 月 22 日至 1943 年 2 月 2 日几乎被全部歼灭。

事实上,遭到这次惨败的是包括一个匈牙利军、一个意大利军和两个罗马尼亚军在内的整个 B 集团军。

这些布置在顿河及伏尔加河一线的部队至少有 100 万士兵,直接负责其战略指挥的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而造成德国第 6 集团军及第 4 坦克军被包围的直接责任者却是最后被希特勒授予陆军大元帅军衔的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因为当时,虽然苏联人为了转入进攻而采取的攻势早已被察觉,但他却没有下决心采取防范措施。

当时在整个顿河一线,不要说作战部队,甚至就连军、师司令部的指挥人员也都蒙在鼓里。当基地司令出于很强的责任心询问是否应当为防范几个月来苏军方面的进攻而采取措施时,他得到的指示却是:听候命令,不得轻举妄动。

但是请您相信我判断的正确性并亲自看一下戈卢宾斯卡亚作战司令部中的情况吧,看看他们在苏军反攻前夕是如何做的吧。

11 月 18 日——司令部人员上床睡觉

“当时我们的神经紧张得都要爆裂了。”退役上校,当时德国第 6 集团军第一副官威廉·亚当在他 1965 年出版的题为《重大的决定》一书中这样写道。他寥寥数语便将苏军大举进攻前夕,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麻痹情况描述得淋漓尽致。

他继续写道,毫无疑问,俄国人的大规模反攻已迫在眉睫。如果进

攻开始会出现什么情况？假如第 11 集团军和第 8 罗马尼亚军守不住阵地怎么办？为了自我安慰，1942 年 11 月 18 日这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反攻前夜，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都上床睡觉了。

电话铃猛地响了起来，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有抓起听筒，就已经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声。我想，那一定是炮声。只听到值班军官报告说：“有紧急情况，上校先生，请立即接司令官！”苏军的反攻开始了。时间是 1942 年 11 月 19 日。威廉·亚当在报道中继续写道。

我穿上军装和长靴，急忙向指挥所跑去；那里此时已经聚集了一些军官和士兵。他们也同我一样是从睡梦中惊醒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已向全军发出了进入戒备的命令。我到了以后不久，最高司令官保卢斯在施密特陪同下来到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驻守在奥西诺夫斯科耶的第 11 集团军司令施特莱克尔将军报告说：“这里真是见鬼了，难以想象的密集炮火打向我们的阵地，我们损失惨重。但主攻目标似乎是针对罗马尼亚人。”保卢斯将军立即向施特莱克尔做了如下部署：“我计划派第 14 坦克师到马尔—克莱茨卡亚西南一线增援，确保你的左翼安全。此外，一旦掌握了敌方的确切进攻方向，再向我作详细报告。”（直到苏军已突破了 30 公里之后，保卢斯才考虑。其实早在苏军 11 月 19 日发动进攻之前几个月，他从第 6 集团军每个士兵的嘴里恐怕都能听说主攻方面在哪里。——风言风语）

将第 14 坦克军从城里撤出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早晨 7 点，11 集团军司令施特莱克尔又以确凿的语气报告说，反击正在进行。目前我们能够坚守住阵地。

但是高射炮部队罗斯巴赫少尉的报告正好相反。当时他是伯尔和马尔—纳巴托夫斯基基地的指挥官，同时也担负着保卫第 6 集团军捷夫拉皮耶夫斯基野战机场的任务。这位基地指挥官与集团军司令官不同，他对已经发动的进攻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并迅速决定，连同当时正停放在机场上的完好的 10 架双体侦察机撤离机场。

当罗斯巴赫用望远镜看到远处苏联的士兵已经在一些飞机残骸上爬上爬下，寻找战利品时，他更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拼命逃跑的德国军官，有的甚至连帽子都跑掉了。他们

从罗西诺夫卡的第 11 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基地。

这时从各地来了许多辎重队。在这种情况下,少尉立即调动他们加强了对伯尔和马尔—纳巴托夫斯基两地的守卫。经过了多次反问和更正之后,他的上级佩斯科瓦特卡的第 8 集团军下达给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坚守住阵地和戈卢宾卡大桥,直到第 16 和第 24 坦克师赶到,然后经顿河桥从卢特申斯基地区撤向佩斯科瓦特卡。”

高射炮队少尉一直坚守阵地到 11 月 23 日。在这场战斗中,他还得到了一个 150 毫米榴弹炮连的支援。这个连当时失去了上级指挥,于是归到了基地指挥官的指挥下。这个炮连用直射的方法阻击了来自南边经戈卢宾卡而来的越来越强大的进攻。

伯尔和马尔—纳巴托夫斯基一线已完全处在对方火炮的猛烈轰击之下。巨大的后勤仓库已成为一片火海。其中有奔逃的辎重兵,伤员和死尸。直到下午,第 16 坦克师的第一批坦克终于从顿河丘陵公路驶到了。

少尉立即与坦克师的指挥、独臂将军胡伯取得了联系,并就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措施以便将这一地区的大批后勤单位及被打垮的部队残部撤往顿河以东征询了他的意见。

但这位师长的回答却是令人沮丧的:“我的部分坦克必须在这里补充燃料,有些留在这里,其余的要继续向前开!”少尉一下子呆住了,他看着师长问道:“那这群人怎么办?”说着他指了指小村子。此时,驻守在那里的炮兵连已打光了所有的炮弹。村子里的房屋在燃烧,士兵们不知所措,四处乱走,到处是伤兵和阵亡者的尸体。

但是这位赫赫有名的胡伯将军喊道:“这群人?”此时他的神经显然紧张到了极点。他会被夹在中间,已经没有别的花招。口号只能是“谁有办法谁自救”!接着他一句话不说,丢下发呆的少尉,钻进坦克越过马尔—纳巴托夫斯基轰隆轰隆地向北驶去。

野战重榴弹炮连也急忙撤出了位于戈卢宾卡大桥附近的阵地,并跟上了离去的坦克部队。失去了指挥的士兵从高地上下来,一窝蜂地向顿河岸逃去。原来在古斯豪夫指挥所中指挥的第 6 集团军的参谋军官们这时早已撤走。敞开的门和空空的窗洞这次也证明;通过仓促逃离他们才又逢凶化吉。

我在《狗,你们想永生吗?》的报道揭示了最高指挥机构的道德堕

落，目击者报道的上述情景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一描述揭示了对第6集团军的覆灭负有责任的真正的幕后人物，给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人士课以重罪，他们为了利己的目的让那些虔诚的青年白白送死，而现在该由他们决定问题了，他们却可怜巴巴地无所作为了。

由此也为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证据，即造成第6集团军被包围及最后被全部歼灭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罗马尼亚军战线的崩溃，而主要是由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及其下属的集团军司令部的无能，他们应当对这场大灾难负责。

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历史事实，我曾先后写过《狗，你们想永生吗？》、《鱼从头臭起》和《德国佬，上前线！》三部书。这三部书被称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三部曲。自这几部书出版以来，又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很多记述当时这一段历史的出版物。这些书刊都证实了我报道的观点，并且也有很多人甚至在数年之后还自愿向我提供证据。

他们的判断以及五十年来我对这些资料的广泛研究（我在苏联几个战俘营中当战俘时已开始）使我有资格对那个时代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但也揭示了通过不断进步的社会过程显露出来的相互间的因果关系。

苏联人有一句常用的谚语叫“鱼从头臭起”。在1941到42年冬季危机中已呈现出明显的战争疲惫状态，这首先反映在双方的高级军事人员身上。那时，希特勒已不能以必要的强硬姿态来对付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变得缺乏信心，身体和精神状况也每况愈下。

此时，“敌人已经被打败，他们再也爬不起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了空洞的言辞。其实希特勒在1941年年底喊出这个口号时，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俄国人的反攻将会越来越猛烈，前线的士兵只有凭着一种最大的献身精神和无条件的投降才有可能逃过这场在所难免的大劫难。但日本人把这话看作是敦促参战，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是不可接受的。

当时，东部前线的士兵们都清楚自己陷入绝望的境地。他们在衣物和食品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冒着常常是零下42至48度的严寒一直坚持到了1942年的春季。接着他们又以其超人的忍耐力于春季在卡尔科夫成功地进行了反击，并于1942年的6月28日和30日发动了新的夏季攻势。

作者在 1941 年的 11 月到 12 月期间，即东部战线将不可避免地全线崩溃时正在列宁格勒前线。在彼得霍夫、奥拉宁拜恩附近，越过普希金和秋多沃他参加了攻占提温的战斗。他所在的连队在沃尔赫夫斯泰罗耶森林一战中损失巨大，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于 1941 年的圣诞之夜被用运送伤员的专用列车由诺夫哥罗德运到了东普鲁士。

走向没落的道路

希特勒感觉到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中一些将领与他对抗，但他似乎已没有力量再像斯大林那样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将领。斯大林依靠群众运动能够牢牢地控制他的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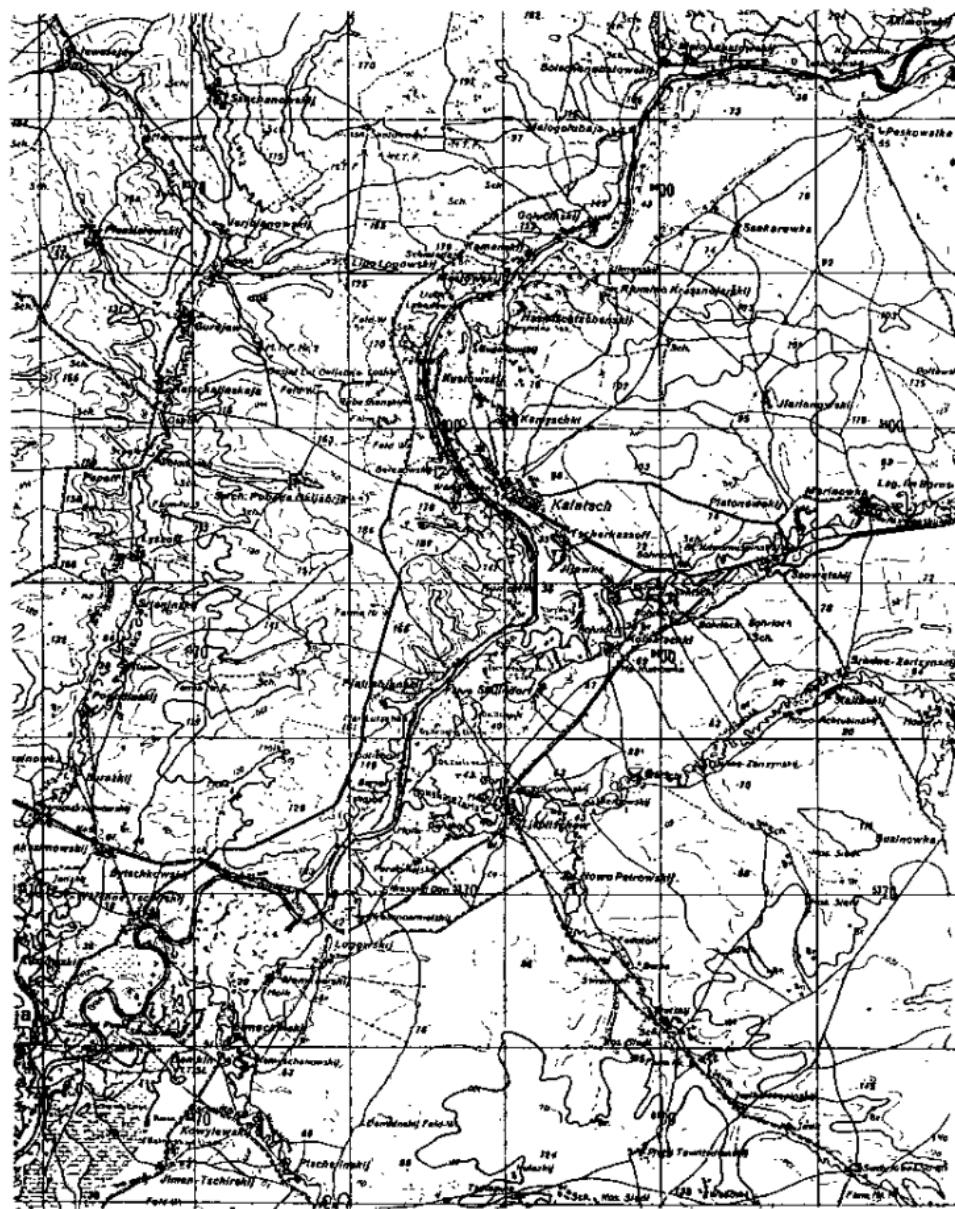
希特勒在选择其军队指挥将领方面的失误预示着他及德国开始走向没落。否则他不会作出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任用像保卢斯这样一个人来担任第 6 集团军的指挥官。第 6 集团军是一支在未来 1942 年的攻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队。它的任务是：跨过顿河和伏尔加河并继续向北推进，攻下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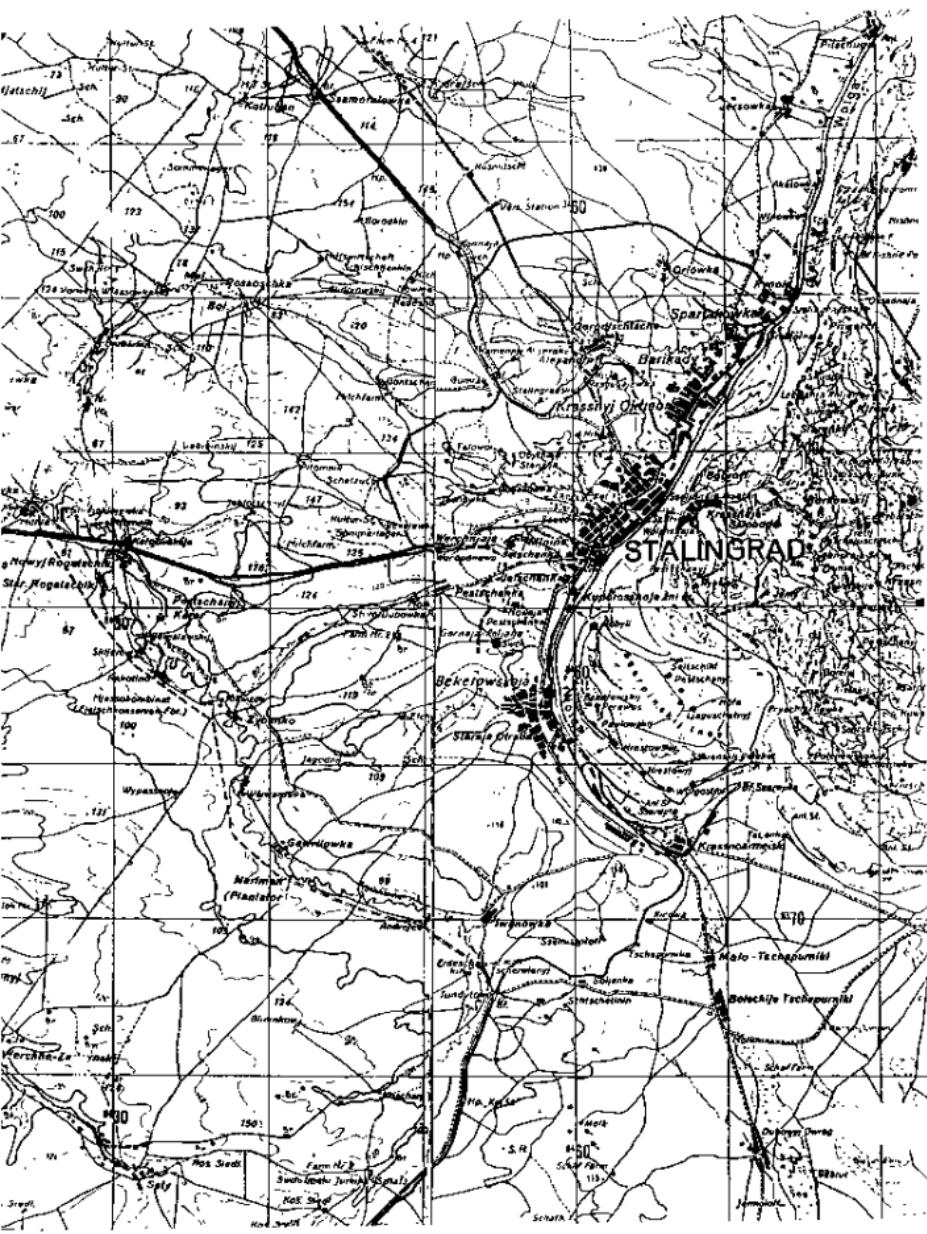
正确的选择恐怕是赖兴瑙或者古德里安这样的将领，他们想使坦克部队居于领先地位，保留它的优先权，敞开侧翼，继续向前推进。希特勒了解保卢斯，但他还是把他调到自己身边，进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委任他完成总参谋部为“巴巴罗萨计划”（即进攻苏联）所做的工作。

元首也了解一个同名的统帅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的悲剧角色。公元前 216 年罗马执行官保卢斯在坎尼附近的一次天才的包围战中被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全部歼灭。这一包围战成了普鲁士军事战略的范例。罗马统帅本人也命丧黄泉。

当然这种同名的巧合对弗·保卢斯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也因此而被他的那些军校同学称作是“优柔寡断的保卢斯”。这种素质显然不适合作为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由于心理上的负担，保卢斯做事总是瞻前顾后。1942 年 12 月 19 日，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保卢斯曾到巴塞基诺同塔塔西诺将军进行过一次谈话。

当时，保卢斯告诉塔塔西诺将军，增援部队已经渡过了距包围圈南部边缘约 42 公里的玛斯赫科瓦河，正在库姆斯基地区进行艰苦的防御战。保卢斯一面谈战区形势，一面介绍他所计划的突围方案，很为自己







Bei oft unerwartet auftretenden Regenfällen versanken die Militärfahrzeuge im Schlamm und machten den Vormarsch unmöglich.



Brücke bei Narrimon über die Tscherwenaja

所设计的计划而自豪(见书)。

但是,突然保卢斯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他用几乎是乞求的口吻要求罗马尼亚将军给他以勇气。他谈到自己与那个罗马执行官兼统帅 A·保卢斯同姓,怀疑自己是否也会遭到与这个人同样的结局。就这样,12月19日他失去了为第6集团军解围的最后机会,使得第6集团军的覆灭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在显示果断性和冷静的贯彻力的关键时刻(从1942年6月30日起第6集团军居于德国最大进攻战的重点,进入攻击),保卢斯虽然知道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规则,但是他却拒不切实执行。

从一开始,保卢斯的进军就带有谨小慎微和优柔寡断的色彩:且不说他在越过了奥斯卡尔之后便停止了强大的攻击势头,并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寻求与左翼邻军取得联系;在沃洛内其,他因为要等待元首的命令,而使敌人得以撤过顿河并巩固了自己的阵线。

真是优柔寡断的保卢斯,为了避免自己作出决断,他要先查问和证实元首(他夸耀元首是自己的私交)是否同意,或者为了作为元首战略的模范学生,把胜利归于元首的天才思想,而等待元首指示,从而延误战机。

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他却没有力量对那些在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已明显表现出疲惫和谨慎的将军们进行坚决撤换。希特勒很清楚,斯大林格勒(过去叫察里津)1919年成为红军打败邓尼金统帅的白卫军的象征。

希特勒当时甚至就已经认识到,他所处的局势与那时是多么的相似。他担心,这次俄国人也会像上次一样从克莱察卡和塞拉菲莫维奇发动进攻。而后来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得到了消息:卡拉奇附近横跨顿河的铁路桥墩被炸毁,而第6集团军与后方的最重要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2年8月23日下达了跨过顿河向伏尔加发动进攻的命令。此后他也曾有过一次机会,如果他能听从第14坦克军团指挥官冯·维特斯海姆中将通过报告所作的暗示,把斯大林格勒从他的战略计划中划去,那也许是另一种样子。

冯·维特斯海姆中将曾率领第14坦克军团一天之内突击推进了50公里,从顿河直打到伏尔加河畔的雷诺克。他曾提醒注意俄罗斯平